

# 中国经济文化的重构

贾 旭 东

中国已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并以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一支生力军。但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文化上还存在着许多与合理的经济发展相悖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它们既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根源，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从学理上讲，经济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促进或阻碍作用，而经济文化又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改变和发展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文化。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为了保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检讨中国的经济文化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文化的学理探究和国际比较，探讨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几个核心问题。

## 一、经济文化：差异与趋同

何谓经济文化？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十分有限，但这注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药师寺泰藏认为，经济文化就是为使经济得到发展，组织和个人行为的总和。（参见药师寺泰藏）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经济文化是指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他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见亨廷顿、哈里森主编）正如学者们对文化的界定因各自的学术背景等原因而无法统一一样，人们在什么是经济文化的问题上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定义，而是关于经济文化的某种基本共识。也就是说，首先，应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界定经济文化。这是符合经济文化概念提出的背景和历史逻辑的。经济文化的这个特点表明，只有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文化，才属于经济文化范畴。其次，只有尽可能将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独立出来，才能确定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文化的这个特点表明，只有那些其影响能够相对独立地加以测量或考察的文化，才属于经济文化范畴。第三，构成经济文化的各个要素是一个整体，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以整体或系统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对各个经济文化要素实际影响的考察，必须以经济文化的整体为基础，重点是考察那些核心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应将经济文化主要限定在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这些核心方面。第四，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文化既可以作为一个直接因素，也可以作为一个渗透性因素：前者就是文化产业，它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后者则是通过与经济发展的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实现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本文所说的经济文化，是指作为渗透性因素的文化。

根据经济文化的这几个特点，我们认为将波特的定义作为我们探讨的基础是合适的。也就是说，所谓经济文化就是对经济发展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根据这个定义，各种经济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存在于各个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同一个国家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之间, 还存在于同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相同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地区之间。究其根源, 经济文化上的差异源于文化上的差异, 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准确地说, 是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

另一方面, 就经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 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又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原因。这是否意味着经济文化的差异一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回答既是肯定的, 又是否定的。在人们对什么是经济发展的看法既定的条件下, 不同的经济文化会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因为经济文化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也能够阻碍经济发展。当经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时, 就会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 而当经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时, 就会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由于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 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经济文化也不会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文化的差异就不会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因为经济发展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模式, 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 经济文化上的差异, 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因而使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但是,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 由于各国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大致相同, 各国也都必须遵守相同的游戏规则, 因而经济文化显现出日益趋同的发展趋势。波特详细地分析了经济文化日益趋同的原因。在他看来, 这主要是主客观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从主观方面看, 经济观念日益趋同, 因为在如何做到经济繁荣这一问题上, 全球各地的意见正日益趋同。这具体表现在对经济繁荣的基础和适当的政策选择的意见分歧正在缩小, 而关于什么是有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的知识正在迅速传播, 而且都迫切地争取符合全球经济的要求。从客观方面看, 这种趋同作用一是由强大的国际压力促成的。生产率范式方面的见解日益趋同, 使那些未能实际遵循这一范式的国家受到强大的压力。经济政策和行为日益受到跨国的衡量和比较; 对于经济行为是否有利于生产率, 全球化是奖惩分明的。经济文化能推动生产率提高, 就会引来空前大量的资本、技术和经济机会。因此, 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接受生产率文化。二是由于各国内部要求变革的力量存在。由于新经济强大力量的影响, 以受过新经济文化训练的新一代管理人员为主体, 各国内部存在着要求变革的力量。(见亨廷顿、哈里森主编, 第 58-60 页)

经济文化的趋同突出表现在, “一种国际性的经济文化的核心内容正在出现, 它跨越各种传统文化的界限, 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共有。”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一批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将成为共同性的, 而显然不利于生产率的文化因素将会在全球经济的压力之下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的机会的促进之下, 逐渐消失”。经济文化的趋同是否会导致经济文化差异性的消失呢? 波特认为, 经济文化的差异仍然会继续存在, 因为“各个社会仍会有一些独特的需要、技能、价值观和工作模式, 这些将构成经济文化的一些各自不同的方面。这些有利于生产率的文化特色, 例如哥斯达黎加对生态的热心, 美国对于方便的迷恋, 日本对于游戏和卡通的爱好, 会成为别人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造成国际专业化的新格局”。(同上, 第 60-61 页)

波特所说的日益趋同的经济文化就是他所提出的生产率范式的观点, 和他关于经济文化仍存在差异、但不再因此使人们受隔绝而陷于经济劣势、相反能促进重要的专业化优势的观点, 极具启发意义。但是, 波特的观点也存在着两个需要商榷之处: 第一, 趋同的经济文化是否就是他的生产率范式? 按照波特的逻辑, 各国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基本一致, 因而内外部主客观两种力量迫使各国接受生产率范式, 走相同的经济发展道路。然而事实上各国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文化的趋同应该围绕着全球化游戏规则所体现出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方面进行, 但这方面的斗争是激烈的, 因而趋同的道路是漫长的。第二, 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否像他说的那样在缩小? 波特认为, 经济文化的趋同已经缩小了文化属性影响社会经济道路的选择余地。波特的这个结论是与他的生产率范式趋同紧密联系的。正是由于他的生产率范式方面

的问题,导致他的这个结论具有不可靠性。经济文化的趋同不仅不会造成经济文化差异的消失,相反,这种趋同可能更会促使各国重新评估自己的发展道路。经济文化的差异不仅仅只是带来专业化的优势,更会造就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 二、科学发展观:经济文化新的核心理念

中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经济文化的改变。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人们的心底唤起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富裕的信念。正是结束贫穷、渴望富裕的强烈愿望,使安徽农民冒着掉头的风险私分了土地,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本着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开始,由农村到城市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经济文化是比较片面的。当然,我们不应该脱离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去评价这种经济文化,而是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对中国发展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结束贫穷、走向富裕不过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之一;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扩展人们的选择范围。当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20多年以后,上述经济文化引导的经济发展所积累的问题开始加深,如片面追求GDP所引发的低效率、环境问题和社会文化领域发展滞后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首先,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第一次赋予发展以科学的价值取向。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脱离了“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的发展,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其次,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主题,摆正了经济发展的位置。过去一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将中心作为全部,而忽略或无视非中心的那些部分的发展。在科学发展观中,经济发展仍然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但已不再是发展的全部目的,而是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却非惟一的内容,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科学发展观中,发展始终是以人为核心的。第三,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中国已经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成为世界经济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同时也要受制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逻辑,受制于全球性的游戏规则。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要想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都要学习和遵守全球性的游戏规则,都要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模式,并使之与本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相融合,进而发展出一套新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模式和管理模式,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模式。其理由很简单,既然我们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就不得不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获得自己的经济发展:不理解、不懂得全球性的游戏规则,就不能用好用足这些规则为本国的经济发展争取有利的经济环境,创造有利的条件和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不遵守全球性的游戏规则,就会给自己制造发展的障碍;不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模式,就不可能快速扭转落后的局面,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力。但是,如果不将这些学习的成果与本国的国情相结合,不与本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相融合,那些先进的东西就也会因水土不服而不能消化,或者受到排斥,因而不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甚至还可能引起混乱。

这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要发展,必须对这些不同的经济文化进行整合,以使之互相协调,共同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对这些不同的经济文化进行整合时,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

处理好作为普遍性的经济文化和作为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经济文化间的关系。从原则上讲,两者应该互相协调而不是互相矛盾,因为它们应该统一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系统之中,作为信念、态度和价值指向,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影响人们的追求、思维方式和经济行为。这种整合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文化的重构过程,这种整合的结果就是中国新的经济文化的形成。

由于经济文化是对经济发展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所以在经济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核心理念,以统领经济文化的各个构成要素。这个核心理念应该能够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能够为各种制度建设提供价值指向,能够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行为边界。根据这一标准,科学发展观堪当此任。如果说结束贫穷、走向富裕是上个世纪后20年中国经济文化的核心理念,那么科学发展观则构成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新的核心理念。这个新的核心理念集中阐明了我们所追求的发展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结束了我们对于发展的模糊观念,实现了由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转变。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总方向预示着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如:以解决“三农”问题为核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使城乡之间协调发展;以开发西部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为核心,促进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使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以解决环境问题为核心,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减少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使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以解决就业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为核心,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和社会稳定;以文化体制改革为核心,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使经济发展和社会领域、文化领域之间协调发展;以放宽限制、拉动内需、增强活力为重点,促进国内发展,使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互相协调。

### 三、竞争力与消费者权益:经济文化新的价值指向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理念的经济文化,根本的价值指向是“以人为本”。作为思维方式,“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将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作为价值目标,“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切实做到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也就是说,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需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创造人们平等发展的社会环境,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可以分解为竞争力和消费者权益两个方面。重构经济文化应该以竞争力和消费者权益为价值指向。过去的经济文化强调的是效率和效益,追求的是经济增长。这种经济文化存在的基础是市场环境比较宽松,竞争强度有限。因此,只要投入少产出多,或者投入一定产出增加,经济发展就是有效率的,相应地也能够带来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现在的市场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消费者的成熟和买方市场的形成,因而使市场竞争的强度大大增加。如果说过去的问题是如何争取多产出的话,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生产出的产品是否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价值,是否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偏好。如果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无人问津,那么生产得越有效率,损失就越大。买方市场的最大特点是“消费者稀缺”,因此营销能力至关重要,它关系到能否争取到更多的消费者的问题。注意力经济就是这种现实的客观描述。这些新情况表明,促进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正在转移:消费者的权益和产品的竞争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关键性因素。

竞争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从经济学各学科所关注的影响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可以看出,经济学对竞争力的研究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这就是仅仅将竞争力的研究局限在生产者及其对生产者有影响的方面,而没有看到消费者对竞争力的现实影响。这充分反映了旧的经济文化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强调在经济文化重构中,要将“以人为本”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并将竞争力和消费者权益作为经济文化新的价值指向。事实上,除了生产者等方面的因素外,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及其变化特

别是潜在的需求,也是影响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竞争力的研究必须引入消费者因素。将竞争力作为经济文化新的价值指向,旨在使广大厂商时刻注意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及其变化,并寻求用消费者喜爱的方式去满足其需求。

当然,将竞争力作为经济文化的价值指向,直接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发展。虽然竞争力的持续提高能够增加消费者权益,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竞争力因素主观上的出发点还是厂商,其背后的决定性的动机还是经济利润最大化。然而,就经济发展而言,利润最大化不应是最终目的,经济发展本身也不能成为目的;真正的目的应是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扩展人们的选择空间。因此,新的经济文化还要以消费者权益为价值指向。要不断地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配给广大人民,满足他们的多方面需求,落实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政治文化权利,为他们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这里,正确处理厂商利润与消费者权益是一个关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美日等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企业经营战略和企业哲学CS(Customer Satisfaction),即“顾客满意”。CS战略的基本精神是追求“顾客满意”。在CS企业,“顾客满意”是惟一目的,获得利润不过是“顾客满意”的结果。CS企业同样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不同的是,利润最大化并不是它经营的目的,而是它经营的结果。只有尊重消费者权益,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厂商才能获得利润。也就是说,只有真正落实消费者权益,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将消费者权益作为经济文化的价值指向,旨在使广大厂商摆正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权益的关系,将消费者的权益放在首位,这样才能够赢得消费者,真正实现利润最大化。

#### 四、制度创新:经济文化重构的基础与保证

对于制度与文化间的关系,以往的制度分析通常注重分析文化对制度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制度对文化的影响。且不说广义理解的文化本身就包含着制度层面,仅就人们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而言,制度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创新是文化变迁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了经济文化与制度创新相互影响的事例。

经济文化的变化导致制度创新。中国的发展是从解放思想、转换观念开始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首先统一了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用这样的标准衡量,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倡导的经济文化是错误的,它是中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的根本原因。废除这种落后的经济文化,代之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力量逐渐强大,而阻碍改革的力量逐渐减弱。制度创新的需求和供给的能力、意愿共同促成了制度创新。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让位给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看到,这种制度创新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多次反复才最终完成。这种因经济文化更新而引发的制度创新,是经济文化的制度化的过程。

经济文化的制度化是文化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文化是一个系统,具有内在结构。这种结构如何,因人们对文化的解释不同而不同。人们普遍认为,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这种观点不能说不,但总有些不清楚之处。如,理念是否一种价值观?理念具有价值观的一些特征,但是理念似乎在价值观之上。沙因给文化下的定义似乎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沙因认为,“文化是一个群体所学到的一系列共享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可以解决这一群体的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的问题,并且由于它行之有效,所以被大家认为是合理的。因此,这些基本理念就被传授给新的群体成员,使他们对相关问题形成正确的感知、思考和行动方式。”(见尚克尔曼,第10页)文化由三个层面构成,最上面的一层是表面物质层,第二个层面是支持性的价值观,最核心的层面是基本理念。我们只有了解这些基本理念,才能正确分析文化的物质层,准确评估支持性的价值观的可信度。基本理念的变化必然引起价

值观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感知、思考和行动方式的变化,必然引起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方式的变化。由于这些变化共同指向制度,因此制度变化就是必然的。

经济文化的制度化就是以制度创新的方式,将经济文化转化为新的制度安排。每一种经济体系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文化;当原有的经济文化不能适应新的经济体系的要求时,经济文化的转型或重构就是必然的。在经济文化转型或重构的过程中,新的经济文化与旧的经济文化有一个相当长的共存期。在这个共存期中,新旧经济文化处于矛盾冲突状态之中,而旧的经济文化还有相当的影响力。为此,将新的经济文化转化为新的制度安排,是促使新的经济文化尽快占据主导地位的必要举措,是使新的经济文化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积极影响的关键。制度作为一种游戏规则,具有一种核心的价值指向。每一种制度都有两种机制,即动力机制和惩罚机制。通过这种奖惩机制的设立,制度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机会集合。经济文化的制度化,就是要将经济文化的核心理念作为制度的核心价值指向,推动制度创新转化为新的制度安排。新的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经济文化的核心理念,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新的框架,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没有经济文化的制度化,经济文化重构的成果就得不到巩固,它对经济发展应有的积极作用就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制度创新对经济文化重构的保证作用,还体现在经济文化重构的过程中。经济文化是一个系统,是许多理念的集合体。经济文化重构的过程是这些理念形成和整合的过程,制度创新在这些理念形成和整合的过程中起着基础的作用。科学发展观就是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的创新实现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新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经济实践,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新问题。突出的问题就是发展不平衡:一方面是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发展的严重滞后。同时,经济发展出现难以持续的征兆。如: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维持已有投资规模的资源支撑力和环境可承受能力在逐渐减弱,经济效率下降,等等。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迫使人们反思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在对以往经济发展模式反思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原来是发展观出了问题,于是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没有 20 多年的制度创新,就不可能有科学发展观。

新的经济文化理念的形,推动新的经济实践,进而引发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又强化了新的经济文化理念,进一步推进经济实践,从而引发更新的经济文化理念的形;经济文化理念不断形成和整合,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这就是经济文化与制度创新之间互动关系的基本模式。

#### 参考文献

- 奥斯特罗姆、菲尼、皮希特 编, 1992 年:《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
- 亨廷顿、哈里森 主编, 2002 年:《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
- 胡锦涛, 2004 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
- 金碚 主编, 2003 年:《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 (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诺斯, 1994 年:《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 尚克尔曼, 2004 年:《透视 BBC 与 CNN:媒介组织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
- 温家宝, 2004 年:《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载《人民日报》3月1日。
- 药师寺泰藏, 2004 年:《要重视经济文化》,载日本《外交论坛》10月号。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华 敏

center shifts from West Asia and Egypt to Greece and Rome. Late Greek philosophy is the product of the Mediterranean cultural phenomenon. Corresponding to the Mediterranean context, a new shift takes place in Late Greek philosophy from focusing upon *ti esti* (what is) and *dia ti* (why) to focusing upon *to hou heneka* (for the sake of), and from emphasis of “seeking truth” to of “seeking goodness”. Consequently, philosophy of morality moves towards religion. In this way, Greek philosophy has got a double retribution: providing Christianity with rich ideological resources on the one hand, and becoming the “gene” of modern philosophy on the other hand.

## **Deep Problem of Free Will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Solution**

Tian P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urface freedom” and “deeper freedom”, and thus between “surface problem of free will” and “deeper problem of free will”, is made by some philosophers of ac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free will. By appealing to this distinction, especially throug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of free will in the deeper sense, some philosophers made progress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free will in the naturalist direction. It is remarkable that on the basis of a reflection on Davidson’s model, Frankfurt takes “higher-order motivation” to be the key to solve the deeper problem, and Velleman further develops an epistemologic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However, the epistemological solution has its own problems. Reflections of the problems suggest that tel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may be needed for a solution to the deeper problem of free will.

## **Confucian Ethics and Emotions**

Wang Yunping

There are diverse understandings of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emotions in different ethical theories. By deep inquiry into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texts, we can see that the Confucian sense of ethical life is also a kind of emotional life, and the Confucian virtues such as “filial love” are inclinational. Based on these observations,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emotions are morally significant in Confucian ethics. The reason is that Confucians regard emotions as given by Heaven which already embraces cognitive dimensions in themselves. The Confucian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s will help us reevaluate the presupposition of reason-emotion dichotomy which is prevailing in Western ethical theories.

## **Re-Constituting Chinese Economic Culture**

Jia Xudong

Different economic culture creates different mode and pathwa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 mode and pathwa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es establishing different economic cultures adapting to them. In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with the hope of people-oriented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to integrate Chinese economic culture, in order to form a new economic culture which can not only adapt to international game rules, but also lead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high speed and good conditions. The process of this integration is to reform Chinese economic culture. To re-constitute Chinese economic culture, the guiding idea should be the viewpoin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fundamental orientation value should be the competence and benefit of consumer, and the foundation should be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